

周作人的历史循环论

——从巴枯宁的警句说起

小川利康

论文摘要：周作人创办《语丝》时期开始提到历史循环论。他在《问星处的预言》（1924年7月作）否定巴枯宁的警句，反其言认为：“历史唯一的用处是告诉人又要这么样了！”。警句来自周作人所译《俄国革命之哲学基础》（1919年3月）。警句则在介绍巴枯宁批判达尔文进化论的一段。巴枯宁依据克鲁泡特金《互助论》提出人类通过互助才得以进步的观点。周作人却在创办《语丝》前后多次译介葛理斯（霭理士）的著作，对巴枯宁的进步观念表示怀疑。在《葛理斯随感录抄》（1925年1月）提出进步不是可以当作“向着固定的完成之进步”，即此一例。在葛理斯影响下成立的“生活之艺术”思想立足于历史循环论，改变了周作人历史进步观念以及“单纯信仰”（simple faith）。

关键词：周作人；鲁迅；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进化论；霭理士；

1. 问题的提出 —— 巴枯宁的警句

周作人在《问星处的预言》（《晨报副镌》1924年7月5日）警告人们中国以后要重演历史。如下写道：

昔巴枯宁有言，“历史唯一的用处是警戒人不要再那么样”，我则反其言曰“历史唯一的用处是告诉人又要这么样了！”。苟明此义，便能预知国民

之未来，“虽百世亦可知”。我依据这个星光的指示，豫言中国国民暂时要这样地昏愤糊涂下去，但是以后也未必更利害，因为已经糊涂到这个地步，也无从再加糊涂上去了^[1]。

据周作人《北大感旧录十——钱玄同》（《知堂回想录》164，1962年3月12日）可知当时的情况。1922年冬，“北洋政府的国务会准备通过取缔新思想案，决定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成员作为他们将要迫害的对象”。这时周作人发表《思想界的倾向》（1922年4月）表示忧虑：“据我看来，这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他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与排外，那国粹派未必真会去复兴明堂或实行攘夷，但是在思想上这些倾向却已显著了”。不过胡适对此提出异议，批评周作人“未免太悲观了”。后来由于北洋政府内部发生纠葛，幸好取缔案没落实。但1924年6月17日，钱玄同以“夏”的笔名在《晨报副镌》上透露《胡适文存》、《独秀文存》等书籍已在北京城内禁售之列了^[2]。冷酷现实果然证实周作人的忧虑。

周作人就在此刻道出的“历史唯一的用处是告诉人又要这么样了！”。这句反话警告人们未来也会重演历史，似乎可看作一种循环史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后来在《代快邮》（1925年8月）、《命运》（1927年4月）、《阳九述略》（1944年4月）、《十堂笔谈（五）国史》（1945年1月）、共四篇都在反复道出这句反话。对此前人研究也很早注意到；如伊藤敬一指出“周作人的思考方法藏有蔼理斯那样的二元论或循环论式的东西”^[3]。诚然，周作人在创办《语丝》的前后开始多次译介蔼理斯的文章，提起巴枯宁警句的背后隐藏着1924年开始发生的思想变化。小文企图探讨周作人否认巴枯宁警句的意图所在。

2. 巴枯宁的警句的出处

我们先核对一下巴枯宁警句的出处。

周作人曾翻译过《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新青年》第6卷4、5号，

1919年4月15日), 当中一段里有介绍巴枯宁的思想。虽是译作, 但这篇论文收入於《艺术与生活》, 排在《日本的新村》前列, 可看作新村主义的一部分。原著者系 Angelo S.Rappoport (拉波博尔特 1871-1950), 原刊登于 *The Edinburgh Review* (1917: July.), 这篇论文后来收入於单行本 *Pioneer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印行^[4]。

通读这篇论文立刻明白: 题目虽为“俄国革命”, 但开头讲述俄国革命前史之后, 很快就进入俄国哲学思想史。整体篇幅的一大半讲述民粹派理论家的拉夫罗夫(Pyotr Lavrov)与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Mikhail Bakunin)。而且拉波博尔特注重讨论人类社会该如何进化的问题。无需说进化论本来是生物学理论, 并不是针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 但达尔文提倡进化论后, 从19世纪末开始, 社会进化论(即: 社会达尔文主义)风靡一时。拉波波尔特的讨论也属于这一类。

介绍巴枯宁之前, 拉波博尔特先说明: “Bakunin 是唯物论者, 所以他认定人类只是进化最高级的动物: 思想这事物, 不过是脑里的一种物质发生物。人与下等动物不同的缘故, 便只因他有思想的能力与合群性”。那么: “人类的所以能够发达到了现在的地位, 都应感谢过去及现今的社会公众的合群的努力”。这里不难看出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影子。克鲁泡特金反对达尔文在《物种起源》提出的生存竞争促进进化的主张, 在《互助论》主张动物中间的互助对进化起到重要作用。克鲁泡特金在著作里从观察动物的基础出发, 进而讲述中世城市的互助以至现代人的互助生活。巴枯宁沿用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 认为人类也从动物进化的, 自然应该往前走, 不要往后退化到“动物”了。

强调巴枯宁受到互助论的影响后, 拉波博尔特则摘译巴枯宁的话: “历史的真正伟大高上的目的, 便是个人的真实完全的解放”。那么以往历史因袭应该尽数弃去。因为进步这事, 就是指逐渐脱掉过去的错误。所以巴枯宁极力主张:

我们的动物性, 在我们的后面; 我们的人性, 是在我们前面: 只有这人性, 能给光明与温暖与我们。我们决不可回顾, 应该单向前望。倘我们有时

回顾过去，这目的只在看清我们从前如此，以后不要如此^[5]！

与周作人在《问星处的豫言》道出的巴枯宁警句对比起来稍有出入：拿来前面的“历史的真正伟大高上的目的”句子与后面一句“以后不要如此！”搭配起来，补上“警告”等词语，写成“历史唯一的用处是警戒人不要再那么样”了。句子虽有改动，意思却一贯的。但不参照上文，无法明白如此历史观涉及到进化论。与上文合起来看可以确定：巴枯宁所企图的不只是历史观的问题，而是警告不要人类“退化”的。那么周作人的反话“历史唯一的用处是告诉人又要这么样了”背后的意思也不只是单纯的历史循环论，而是警告人类要“退化”了。

3. 进化论与遗传

周作人1925年8月发表《代快邮》。时逢五卅运动，国内抗日爱国风潮达到高潮，俞平伯发表杂感《雪耻与御侮》，认为“被侮之责在人，我之耻小；自侮之责在我，我之耻大”^[6]。对此遭到郑振铎等人的反驳。周作人支持俞平伯，挖苦左袒爱国运动的孙伏园，如下说：

我很惭愧自己对于这些运动的冷淡一点都不轻减。我不是历史家，也不是遗传学者，但我颇信丁文江先生所谓的谱牒学，对于中国国民性根本有点怀疑；吕滂（G. Le Bon）的《民族发展之心理》及《群众心理》（据英日译本，前者只见日译）于我都颇有影响，我不很相信群众或者也与这个有关。巴枯宁说，历史的唯一用处是教我们不要再这样，我以为读史的好处是在能豫料又要这样了；我相信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事中国此后也不会有，将来舞台上所演的还是那几出戏，不过换了脚色，衣服与看客^[7]。

这里他重复道出警句，对中国国民性表示强烈怀疑的同时认为历史会重演的。他在下文还指出：“照现在情形看去与明季尤相似”。在此更清楚地表示历史循环

论。我们一般认为以往的事情不会重复一遍。因为随着时间推移,人事环境都变,不会出现同样的事。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或民族这个共同体总能理出一个共同特征,那么有一个特征很可能招来类似事件。那么周作人此时关注的特征即是遗传。他紧接上文,如下写:

阿尔文夫人看见她的儿子同他父亲一样地在那里同使女调笑,叫道“僵尸!”我们看了近来的情状怎能不发同样的恐怖与惊骇?佛教我是不懂的,但这“业”——种性之可怕,我也痛切地感到^[8]。

在此提到的是易卜生《群鬼》的故事。阿尔文夫人的丈夫以往从外遇得了梅毒,把病传染给夫人。结果儿子得先天性梅毒了。儿子长大后,竟然爱上异母妹妹,阿尔文夫人震惊狂叫“僵尸”,慨叹儿子重演丈夫的罪行。虽然人都换一代,可犯的是同样罪行。周作人认为是遗传所然的。这里用佛教的“业”字表达出来也一样对“遗传”的恐惧。那么上面提到吕滂著作也可看作对“遗传”的恐惧。周作人在《随感录三十八》(1918年11月,这篇也被视为鲁迅之作)上如下写道:

法国 G. Le Bon 著《民族进化的心理》中,说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举其大意)——“我们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将我们一代的人,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较起来,数目上就万不能敌了。”(略)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子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的人物: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竟至百无一免^[9]。

这里周作人在上文说只看过日译本,那么所据的该是日译本《民族發展の心理》(前田長太译、大日本文明協會 1910 年)。划线部分的大致参照下一段^[10]:

死者远比生者多得以万万计，其力量也大得以万万计。(略)死者累积岁月造就吾人思想，造就吾人感情，因之造就了所有吾人之行动动机。逝去之先人不止遗传给吾人其体质，且遗传其思念。唯独死者才是不接受生者之异议的导师也。功罪两方吾人都继承下来了^[11]。

比对划线部分，原文的意思大致与周作人所说相同。但再看曲线部分，可知吕滂也并不认为祖先的遗传都是罪孽。不过周作人忽略了这一点。应该说他比较偏于悲观的。这篇《随感录三十八》原来被认为鲁迅之作，类似想法可在《忽然想到四》找到。他如下写道：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略)元人著作寥寥，至于唐、宋、明的杂史之类，则现在多有。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12]。

这是1925年2月写的。离周作人的《代快邮》的时候相去不远。鲁迅没提到吕滂，但对时光的感受还是接近的。鲁迅提到国民性。慨叹：“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然后“难道竟不过老是演一出轮回把戏而已么？”^[13]。周作人用“遗传”表达难改的中国特征，而鲁迅则以国民性来概括这个特征，认为历史还是“轮回”的。周氏兄弟俩面对北洋政府的专横暴政都感无奈，而认为历史会循环的。但鲁迅的文章里提出历史循环论毕竟为数不多，而周作人今后反复提到的。特别是1927年4月李大钊被捕后写的《命运》充满绝望与悲伤，强调遗传之可怕。周作人的历史循环论虽与鲁迅有共同点，但仍需进一步探讨。

4. 蔼理斯的“二重理想”与进化论

《语丝》创刊号上，周作人发表《生活之艺术》（1924年11月），认为“生活之艺术只在禁欲与纵欲的调和”。这是主要依据蔼理斯的观点。蔼理斯（Havelock Ellis, 1859-1939）以性心理学研究著称的学者，周作人在此主要从性爱方面解释他的思想。但蔼理斯本来不只企图解释性爱，而在探讨全局人生观。周作人先摘译《断言》里的《论圣芳济与其他》的一段话。

（1）“有人以此二者（即禁欲与耽溺）之一为其生活之唯一目的者，其人将在尚未生活之前早已死了。有人先将其一（耽溺）推至极端，再转而之他，其人才真能了解人生是什么，日后将被记念为模范的高僧。但是始终尊重这二重理想者，那才是知生活法的明智的大师。……（2）一切生活是一个建设与破坏，一个取进与付出，一个永远的构成作用与分解作用的循环。要正当地生活，我们须得模仿大自然的豪华与严肃。”他又说过，（3）“生活之艺术，其方法只在于微妙地混和取与舍二者而已，”更是简明的说出这个意思来了^[14]。

这段话作为“生活之艺术”的妙谛，已再熟悉也不过，似乎很多人以为只解释性爱方面的“灵与肉”的对立。其实不尽如此。（1）部分句子里，周作人特意加括号补充“禁欲与耽溺”，这是原文里没有的。由于周作人补充了这一句，结果限制“二重理想”的意思了。原来英文的逻辑结构则不同。蔼理斯原文本来是：（3）➡（1）➡（2）的顺序写的。

（3）部分本来总括整体段落，先说主题：“All the art of living lies in a fine mingling of letting go and holding in.”这并不是限制性爱方面的，而是所有人世间的事情需要微妙的调节。然后在（1）部分讲不要走极端，之后在（2）部分进一步讲两重矛盾不止存在于人世间，还存在于大自然世界，把矛盾提升为自然的循环了。

到了这个地步从性爱的灵与肉的矛盾扩张到生命活动规律的问题了。这段“构成作用与分解作用的循环”，英文则是“anabolic and catabolic rhythm”，rhythm 本义该是节奏，但在此只有两种一同化与异化^[15]。因此周作人翻译成“循环”了。这个同化与异化，换句话说即是生物身体的新陈代谢作用。生物为了延续生命，身体内部需要不断进行吸收营养（同化作用）的同时，需要进行分解营养（异化作用）。葛理斯在此依据生物学的铁道理来解释两重矛盾同时并存也极为正常的。

如此思维方式，在周作人的思想上不是初次出现的。五四运动时期的《人的文学》（1918年12月）上，周作人对人性灵肉解释如下：

古人的思想，以为人性有灵肉二元，同时并存，永相冲突。肉的一面，是兽性的遗传；灵的一面，是神性的发端。……人生的目的，便偏重在发展这神性；……一方面却别有不顾灵魂的快乐派，只愿“死便埋我”。其实两者都是趋于极端，不能说是人的正当生活。到了近世，才有人看出这灵肉本是一物的两面，并非对抗的二元。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16]。

在此周作人表示两边走极端的生活不是“人的正当生活”，然后承认“兽性与神性”并存状态才是正常的，“灵肉是一物的两面”。依据这个逻辑他表示人类是“从动物进化的”，然后强调“动物”的一面与“进化”的一面。周作人在此不否认人类是“动物”的同时，还强调“非动物”的一面。原来他的“二重理想”的思维方式在此早就展现出来。

以今日生物学常识来说，周作人对生物机制的理解完全正确的。但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提出进化论后，对人类与猿类具有共同祖先的观念立即遭到批判和嘲弄。周作人的不分神性兽性的观点当时其实很难得的。我们现在不妨回顾一下前面巴枯宁的话：“我们的动物性，在我们的后面；我们的人性，是在我们前面：只有这人性，能给光明与温暖与我们。我们决不可回顾，应该单向前望”。巴枯

宁把人性与动物性（或兽性）截然分开，因此才叫道：“倘我们有时回顾过去，这目的只在看清我们从前如此，以后不要如此！”。他对兽性的全盘否认之下才能道出这个警句。

如此看来，应该说与周作人的观点实在互不相容。我已在拙稿指出《人的文学》里的如上观点都来自蔼理斯的著作，那么与《生活之艺术》的理想自然会有互相照应的地方^[17]。持有二重理想的观点在周作人的思维上不是偶然出现的，他还在《新文学的要求》如下解释他的观点。

关于第一项，我曾做了一篇《人的文学》略略说过了。大旨从生物学的观察上，认定人类是进化的动物；所以人的文学也应该是人间本位主义的。因为原来是动物，故所有共通的生活本能，都是正当的，美的善的；凡是人情以外人力以上的，神的属性，不是我们的要求。但又因为是进化的，故所有已经淘汰，或不适于人的生活的，兽的属性，也不愿他复活或保留，妨害人类向上的路程。总之是要还他一个适如其分的人间性，也不要多，也不要少就是了^[18]。

这段是解释《人的文学》的部分。他在此讲得更清楚。根据说明人性排除“人力以上的”神性的同时，排除“已经淘汰，或不适于人的生活的”兽性。那么“适如其分”的人性该位于神性与兽性中间了。他经过五四运动时期的探索，最后进入一个境界：即是“中间物”意识。

谈到蔼理斯的“二重理想”，我们不得不面对进化论的真面目。进化论在英国资本主义进入高潮时期亮相登场的学说。虽说是一个科学理论，但难免背着资本主义的影子：即是进步史观。批判达尔文的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也在历史观念上还是支持进步史观。巴枯宁的警句也明白地道出进步史观。那么周作人否认警句，意思即是否认进化论以及进步史观？

5. 一个吊诡 paradox：我们是永远在于过渡时代

周作人的“二重理想”最早在《读纺轮的故事》（1923年11月）提到了。后来还在《蔼理斯的话》（1924年2月）重提一遍，其实《生活之艺术》里提到的是已经第三次了。当中《蔼理斯的话》讲得最为详细。他提出“生活之艺术”后，摘译《性的心理研究》第6卷跋文的一段。

有些人将以我的意见为太保守，有些人以为太偏激。世上总常有人很热心的想攀住过去，也常有人热心的想攫得他们所想象的未来。但是明智的人，站在二者之间，能同情于他们，却知道我们是永远在于过渡时代。在无论何时，现在只是一个交点，为过去与未来相遇之处；我们对于二者都不能有什么争向。不能有世界而无传统；亦不能有生命而无活动。正如赫拉克来多思（Heraclitus）在现代哲学的初期所说，我们不能在同一川流中入浴二次，虽然如我们在今日所知，川流仍是不断的回流。^[19]。

这段是蔼理斯经过长达三十年的著述后写下的感慨。

因为周作人没翻译前一段，意思有点儿晦涩了。蔼理斯原来说：“这种（对性爱观的）转变由医生在门诊部，由教师在学校，由牧师在教堂，由记者在新闻界分别进行的。转变虽然缓慢，但正在我们身边进行的。我很清楚许多人无法接受在此提到的对性爱情况的评价，尤其是在最后一卷（关于性爱与社会）”^[20]。他走过了坎坷之路，终于确信将来对性爱的许多偏见都会消失的。如此信心使他站在“保守”与“偏激”中间，对两边都能表示同情。

不过周作人似乎与其关怀蔼理斯的身世，不如关注他对时代的认识。即对“永远在于过渡时代”感同身受，后来与下面的赫拉克来多思的故事一同在《蔼理斯随感录抄》（1925年2月）、《性的心理》（1933年8月）、《蔼理斯的时代》（1935年1月）反复抄录。那么“过渡时代”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谜团该从赫拉克来多思的思考片段来探索。

赫拉克来多思是公元前 500 年的希腊哲学家。以“一切皆流，无物常驻”之说（*panta rhei*）著称于世。他的哲理句子里有“永恒的活火”。他认为：“这个有秩序的宇宙（*Cosmos*）对万物都是相同的，它既不是神也不是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ever-living fire*），按一定尺度燃烧，一定尺度熄灭^[21]”。赫拉克来多思认为：宇宙是永恒的活火，是万物流转之源，它内部有两种动力，一个则是燃烧的，一个则是熄灭的。在彼此抗衡的关系下，烧得不大不小，一直继续。这个抗衡关系即是“逻各斯（*logos*）”。“逻各斯”在宇宙普遍存在；昼夜、火水、水土等，均以抗衡关系来支撑有秩序的宇宙。蔼理斯提到的“不能在同一川流中入浴二次”也是赫拉克来多思的哲理句子。川流不息，每次入浴，流逝的水也不同了。入浴的人也不断活动，每次入浴，经过新陈代谢的身体也有变化了^[22]。那么看似同一川流，但人也水也都不同，不能说“在同一川流入浴二次”了。基于如上理解，现在可以解释“过渡时代”了。以赫拉克来多思的哲理来解释，“我们”也属于“一切皆流，无物常驻”的一部分。看似没变，但在“逻各斯”的抗衡关系之下，“我们”一直处于“川流不息”的状态，永远处于变化无穷，永不停止的“过渡”状态了。

如此看来，赫拉克来多思的故事可以看作一种很精致的历史循环论。历史循环论本来只有以往的故事的重演，世界没有任何变化。但据上述分析，其实不然的。前面在“生活之艺术”里以新陈代谢的生物学理论来解释“二重理想”，在此更有普遍性的“逻各斯”来解释宇宙上的抗衡关系。世界上所有的事物表面上虽然没有变化，但内部都有抗衡关系，“逻各斯”一直在流转，给世界带来无穷变化。

蔼理斯用的这个赫拉克来多思的哲理句子大概是依据赫胥黎《进化与伦理》的。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以进化论著称，享有“达尔文的斗犬”。他在《进化与伦理》的主篇《“罗马尼斯”讲座演讲》里讲起一个童话《杰克与魔豆》（*Jack and Bean-stalk*）的梗概。魔豆种子发芽成长，形成又复杂又庞大的大棵树，但最后结下新种子后，逐渐瓦解，最后枯萎了。他以此为

例，所有的生命都“像豆子一样拥有同样的潜能，从而造成类似的循环过程^[23]”。然后总结如下：

深刻而理性地把握这一过程的性质，其价值在于，它适用于种子，也适用于所有的生物。(1) 动物界也和植物界一样，从非常低级的形式发展到最高级的形式，生命过程表现出同样的循环进化。不仅如此，放眼望去，(2) 世界上的其他东西，其循环进化也从方方面面显现出来。我们看到，水流入大海又复归于水源：天体盈亏圆缺，绕行之后回复原位；人生年轮的不可阻挡的结局；以及文明史上最突出的主题——朝代和国家的相继崛起、兴盛和没落。(3) 正如没有人越过急流时能在同一条河里落脚两次，也没有人可以准确断定，这个感性世界中的事物当下所处的状态^[24]。

(1) 部分明白地指出进化本身经过循环层层递上去的。不只魔豆，所有的生物都避免不了成长后的衰老，最后完成一个循环过程。(2) 部分再扩张范围，不只生物，世界上有很多事物也有循环过程。之后，他还点出朝代国家为例。(3) 部分介绍川流沐浴的故事。(3) 部分有原著者的注释，标明故事出自赫拉克来多思。原来赫胥黎也认为进化过程里含有循环过程。但以往对进化论的普遍理解上似乎没注意到循环论。上面依据通行本译文核对的，但《天演论》里也可以找到如下一段：

希腊理家额拉吉来图有言：世无今也，有过去有未来，而无现在。譬诸濯足长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是混混者未尝待也^[25]。

划线部分措辞似乎与周作人所说更贴切的。其它部分很难与原文逐句对起来，只好在此省略。但严复按语里说：“此篇言植物由实成树，树复结实，相为生死，如环无端，固矣”，果然严复也认同循环之说。周作人看过英文原文很难证实，

但至少看过《天演论》的这一段。至于蔼理斯看没看过赫胥黎的著作,没有物证,也无法证实。但他们都在 19 世纪末的英国成名的著作家,蔼理斯有几部著作讨论进化论,都提到赫胥黎,著者认为完全可能看过。不过不管看没看过,至少无可否认蔼理斯与赫胥黎之逻辑都一致的。那么我们不妨说周作人所欣赏的“二重理想”论来自于蔼理斯的循环论,而循环论并不与进化论对立,甚至可以说属于进化论的一部分。

周作人摘译蔼理斯的话还不完,下面还有一段,如下说。

在道德的世界上,我们自己是那光明使者,那宇宙的顺程即实现在我们身上。在一个短时间内,如我们愿意,我们可以用了光明去照我们路程的周围的黑暗^[26]。

蔼理斯文中提出“道德的世界(the moral world)”与“宇宙的顺程(the cosmic process:一般译为宇宙过程)”的对立关系。他在此又没有明说,也可以看作赫胥黎《进化与伦理》的概念^[27]。赫胥黎的“宇宙过程”是以优胜劣败的原理来淘汰生命的世界,“道德的世界”是以道德力量来纠正无情无理的宇宙进化。上面说“宇宙的顺程即实现在我们身上(the cosmic process is in us made flesh.)”即根据赫胥黎的理论,意味着“我们身上的宇宙的顺程造化了(人类)肉体”^[28]。宇宙过程没有道德的控制,赫胥黎企图以论理过程(ethical process)来匡时济世^[29]。

于此可以说:周作人对蔼理斯的历史循环论表示全面认同,而且他深刻地领悟进化论内部包含历史循环论。但对进步历史观有所保留。周作人在《蔼理斯随感录抄》(1925 年 1 月)摘译蔼理斯《随感录》:

我觉得自己不能同情于现在通行的厌世思想。(略) (1) 他的错误在于过分地看重进步(progress)的意思,想象以为宇宙的进行(cosmic

advance), 倘若有, 可以真实地现在我们的眼前 (actual to our human eyes)。他不能理解, (2) 那占据人心的 **进化之永久的动作** (ever-lasting process of Evolution), 长有 **回旋之永久的动作** 与之抗衡 (counterbalanced by an equally ever-lasting process of Involution)。

我们当更能了解世界, 如不把它当作向着固定的完成之进步, 却只当作喷泉之接续的迸跃, 光辉的火焰之柱去看。(3) 我们总不能超过赫拉克来多思的这个旧譬喻, (略)^[30]。

(1) 部分虽不否认“进步史观”, 但批评“过分”的依赖。下面接着讲述“宇宙的进行”其实没人能看出来。但由于太乐观的厌世思想的人士不理解这一点。(2) 部分讲: **进化之永久的动作** 与 **回旋之永久的动作** 这两重内部动力的抗衡。再据英文可知两种动力是等量的 (equally), 虽然看不出来“进步 (progress / advance)”, 但还是有进化的。于此可以说: 依据葛理斯, 周作人达到了高一层的进化论的认识。

6. 结语: 科学的命运

如上所述, 周作人的历史循环论可以说是反映他对进化论的进一步认识。等到 1935 年 4 月周作人发表《关于命运》, 他受到永井荷风《江户艺术论》的影响, 更加深化了进化论的认识。

我相信命运, 所凭的不是吾家《易经》神课, 却是人家的科学术数。我说命, 这就是个人的先天的质地, 今云遗传。我说运, 是后天的影响, 今云环境。二者相乘的结果就是数, 这个字读如数学之数, 并非虚无飘渺的话, 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数目, 有如从甲乙两个已知数做出来的答案, 虽曰未知数而实乃是定数也。要查这个定数须要一本对数表, 这就是历史^[31]。

周作人反复强调这不是笼统的算命术。他把“命运”词语拆开说明都有定数的。“命”是先天遗传。“运”是后天的环境。两个因素都有“对数表”即是“历史”。根据周作人的说明，既然有固定的“定数”，如有类似的数字，算出来的结果几近一致。因此这个“命运”确实可算作一种变相的历史循环论。

其实这种思想最早1913年在《遗传与教育》出现，认为“遗传”决定“形质”与“知能”。但“利用外缘以行扬抑，使其遗传之性渐就准则，化为善性”^[32]。外缘即是周围环境。文中讨论教育事业，当时他认为可以通过教育纠正恶性遗传。后来在《命运》（1927年4月）里与巴枯宁警句一同提到遗传，与命运连起来讲：“人终逃不了他的命运，虽然科学家硬叫它曰遗传！”^[33]。

但1934年周作人访日探访旧游之地时，购得永井荷风《日和下駄》，读到书中收入的《江户艺术论·浮世绘之鉴赏》，让他非同一般的共鸣。

这暗示出那样暗黑时代的恐怖与悲哀与疲劳，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正如闻娼妇啜泣的微声，深不能忘记那悲苦无告的色调。我与现社会相接触，常见强者之极其强暴而感到义愤的时候，想起这无告的色彩之美，因了潜存的哀诉的旋律而将黑暗的过去再现出来，我忽然了解东洋固有的专制的精神之为何，深悟空首正义之不免为愚了。……现在虽云时代全已变革，要之只是外观罢了。若以合理的眼光一看破其外皮，则武断政治的精神与百年以前毫无所异^[34]。

永井荷风的如此黯澹的对政治情况的看法是因为他遇到大逆事件有关。众所周知，大逆事件是日本政府以“图谋暗杀天皇”的嫌疑为借口，逮捕日本社会主义先驱幸德秋水等人的一件冤案。他亲眼看到大逆事件的发生，感到震惊，后来他一贯以“戏作者”的身份只写风流故事，回避政治风波。他面对国家大权的横暴感到无奈，“强者之极其强暴”，“东洋固有的专制”历来都没有变化。则说：“武断政治的精神与百年以前毫无所异”。此等感慨他表现为“东洋人的悲哀”。日语

的“东洋人”即是“亚洲人”的意思。里面不只包含日本人，还包含亚洲一带所有人种。

永井的如上观点正与“历史唯一的用处是告诉人又要这么样了！”相同，可以说这又是一种历史循环论^[35]。周作人留日时期早就读过永井荷风的作品，但本来并不欣赏他的作风。但1934年读到这篇后，非常欣赏永井荷风。如此非同一般的共鸣背后，我认为他们共同拥有深刻的历史感悟。

* 本项目获得 JSPS KAKENHI (基金号: 20K00375) 支持。

注释

- [1] 《晨报副镌》1924年7月5日，据《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438-439页
- [2] 《零碎事情》，《晨报副镌》1924年6月17日
- [3] 伊藤敬一「周作人と童話」（東京都立大学人文学部『人文学報』第42期、1964年3月）
- [4] *Pioneer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Brentano's, 1919. 有法文序（附有英译）
- [5] 《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新青年》第6卷5号，1919年4月），此据《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160页。
- [6] 《雪耻与御侮》（《语丝》第32期，1925年6月15日）。此据《俞平伯全集》第贰卷19页。并参照有关通信。《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据俞平伯1925年7月29日或30日、并周作人书信1925年8月1日。
- [7] 《代快邮》（《语丝》第39期，1925年8月10日），此据《周作人散文全集》第4卷254-255页。
- [8] 《代快邮》（《语丝》第39期，1925年8月10日），此据《周作人散文全集》第4卷255页。
- [9] 《随感录三十八》（《新青年》第5卷5号，1918年11月15日），此据《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75页。至于《随感录三十八》的归属问题，早期有汪卫东《周氏兄弟〈随感录〉考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3期）认为是周作人之作。近来有陈汝嫣《周氏兄弟“随感录”归属考证》（《鲁迅研究月刊》2022年底6期）认为“〈随感录〉《三十八》中的 Le Bon 段及《四十二》的作者较大可能是周作人”。
- [10] 法文原本系 *Les Lois psychologiques de l'évolution des peuples*（直译该是“民族进化的心理规律”）。英译本系“*The Psychology of peoples Its Influence on their evolution*”。都与周作人翻译不同。
- [11] 《民族發展の心理》（前田長太訳、大日本文明協會1910年）18页。并参照英译本 *The Psychology of Peoples: Its Influence on their evolutio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898, 10页。日译原文如下：“死者は其数生者に優ること万々にして、その力も亦之に優ること万々なり。(略)死者は歳月に歳月を累ねて吾人の思想を造り、吾人の感情を造り、随って吾人行動の凡らる動機を造りたるものなり。既に逝去せる先人は啻に吾人にその體質を伝

ふるのみならず、また実にその思念をも伝ふ。独り死者のみ生者の異論を受けざる指導者なり。
吾人はその功罪の賞罰兩つながら之を受く”。

- [12] 《忽然想到四》(《京报副刊》1925年2月16日), 此据《鲁迅全集》第3卷17页。
- [13] 《忽然想到四》, 此据《鲁迅全集》第3卷18页。
- [14] 《生活之艺术》(《语丝》第1期, 1924年11月17日), 此据《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513页。
- [15] *St. Francis and Others, Affirmations*, Walter Scott Limited, London, 1898, 220页
- [16] 《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6号, 1918年12月15日), 此据《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87页。
- [17] 《〈人的文学〉的思想源脉论析——葛理斯与新村主义的影响》(《长江学术》2020年第2期)
- [18] 《新文学的要求》(《晨报》1920年1月8日), 此据《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207-208页。
- [19] 《葛理斯的话》(《晨报副镌》1924年2月23日), 此据《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346-347页。
- [20] H. Ellis, *Postscript,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F. A. Davis Com, Philadelphia, 1922. 641页
- [21] 此据英译 “This world-order [kosmos], the same of all, no god nor man did create, but it ever was and is and will be: ever living fire, kindling in measures and being quenched in measures.”, Heraclitus 项,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heraclitus/>) 中译依据“哲学史” http://www.zhhexueshi.com/master/heraclitus_6_1
- [22] 此处解释依据 Heraclitus 项,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heraclitus/>) “It is that some things stay the same only by changing. One kind of long-lasting material reality exists by virtue of constant turnover in its constituent matter. Here constancy and change are not opposed but inextricably connected. A human body could be understood in precisely the same way, as living and continuing by virtue of constant metabolism.”
- [23] 《进化论与伦理学·1893年“罗马尼斯”讲座的演讲》(赫胥黎著、宋启林译《进化论与伦理学》全译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21页
- [24] 《进化论与伦理学·1893年“罗马尼斯”讲座的演讲》22页
- [25] 《天演论下·论一: 能实》(赫胥黎著、严复译), 此据《进化论与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179页
- [26] 《葛理斯的话》(《晨报副镌》1924年2月23日), 此据《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347页。并参照 H. Ellis, *Postscript,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F. A. Davis Com, Philadelphia, 1922. 642页
- [27] 葛理斯对宇宙过程的理解大概基于如下部分: “In fact, I do not know that any one has taken more pains than I have, during the last thirty years, to insist upon the doctrine, so much reviled in the early part of that period, that man, physical, intellectual, and moral, is as much a part of nature, as purely a product of the cosmic process, as the humblest weed.”(T. Huxley, *Evolution and Ethics [Prolegomena 1894]*, *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 Macmillan, London, 1895, 11页)大意: “人的肉体、知性、连德性都与最贫瘠的野草一样是宇宙过程的产物”。
- [28] 例如有 “They also have seen that the cosmic process is evolution; that it is full of

wonder, full of beauty, and, at the same time, full of pain. They have sought to discover the bearing of these great facts on ethics; to find out whether there is, or is not, a sanction for morality in the ways of the cosmos.” (T. Huxley, *Evolution and Ethics* [*The Romanes Lecture* 1893], *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 Macmillan, London, 1895, 53 页)。并参照《进化论与伦理学·1893 年“罗马尼斯”讲座的演讲》23 页, 日译本《進化と倫理—トマス・ハクスリーの進化思想—》(1995 年産業図書株式会社)。

- [29] 有关赫胥黎的学说参照小林傳司《解説》(《進化と倫理—トマス・ハクスリーの進化思想—》)。有关赫胥黎的翻译, 参照沈国威《Evolution 如何译为“天演”?》(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 52 号, 2019 年)
- [30] 《葛理斯随感录抄》(《语丝》第 13 期, 1925 年 2 月 9 日), 此据《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4 卷 51 页。并参照 H. Ellis, *Impressions and Comments*, Houghton Mifflin Com., Boston & New York, 1914, 227 页, 228 页。
- [31] 《关于命运》(《大公报》1935 年 4 月 21 日), 此据《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6 卷 559 页
- [32] 《遗传与教育》(《绍兴县教育局会月刊》1913 年 10 月 15 日), 此据《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1 卷 267 页
- [33] 《命运》(《语丝》第 126 期, 1927 年 4 月 9 日), 此据《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5 卷 200 页
- [34] 《关于命运》, 《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6 卷 560, 561 页。永井荷風「浮世絵の鑑賞」(『日和下駄』春陽堂文庫) 89, 90 页。
- [35] 这个问题已在拙论《周作人と大逆事件》(日本《野草》第 102 号, 2019 年) 探讨过, 只能写从略。永井荷风的历史循环论其实也还是与进化论有着密切联系。